

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的结晶

人类文明的载体

网络的基本资源

编者叙意

二十年代的中国史学界，围绕着上古史问题，产生过一场聚讼激烈、影响深广的学术争论。这场争论的核心在于如何辨别现存的有关古史资料的真伪及以此为基础的中国古史观，挑起这场争论的主要人物，则是后来被称为“疑古史学”代表的顾颉刚。这场争论的文章及以后相关的研究论文，也由顾颉刚等主编收入《古史辨》各册中，成为现代中国史学研究中的最重要文献之一。

顾颉刚，一八九三年出生于江苏苏州市，一九八一年去世于北京。他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是中国现代成就最为卓越的一位史学家。关于顾氏早年的求学和治学经历，他在《古史辨》的第一册《自序》中有过详尽叙述。一般来说，顾颉刚的学术生涯始于一九二二年毕业后的留任北大教职时期，但从现存的顾颉刚的读书笔记来看，大约在二十岁时，他已显示出日后成为一位学者的选择取向（《寒假读书记》，一九一四）。

除了早期任教于北京大学外，顾颉刚在抗战前还先后执教于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和燕京大学等，以后又在云南大学、中央大学（重庆）和复旦大学等执教。新中国成立后，主要担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此外，他的重要的学术文化活动还有，创办了朴社、民俗学会、禹贡学会、边疆研究会、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等，主编过《古史辨》、《燕京学报》、《禹贡》半月刊、《边疆周刊》、《文史杂志》等多种学术刊物，在古籍整理方面，他主持过《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的标点工作。他的主要著作有《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史林杂识初编》、《尚书大诰今译》、《孟姜女故事演变》等等。终其一生，顾颉刚以“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成为古史研究特别是“古史辨学派”的代表人物，同时在历史地理、边疆地理、民俗学等研究领域，也有突出的贡献。此外，他还大力倡导通俗读物的整理、出版。顾颉刚的学术成果，即使在今天，也仍有其显著的影响，广为学者所借鉴或认同。

在已出版的顾颉刚著作中，《史林杂识初编》实际上是在油印本笔记集《浪口村随笔》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可以说，读书笔记在顾颉刚的著述、治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据估计，顾氏一共写有约二百册笔记，计三四百万字。他生前曾有过整理并出版自己的读书笔记的计划（顾洪：《顾颉刚读书笔记》前言）。这一计划在他去世后的十年，即一九九一年，终获实现。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了十卷本的《顾颉刚读书笔记》。

顾氏笔记的学术价值是多方面的。作为一代学术大师，他博涉约取，笔记内容多属籍海探珍、书林撷英，形式上虽似散金碎珠，但其味无穷。他曾说：“吾今有宏愿在：他日读书通博，必举一切附会一切影响皆揭破之，使无遁形，庶几为学术书籍人心世道之豸。”顾颉刚读书笔记的价值，是与这种读书、治学的动机分不开的。其次，读书笔记贯穿了顾颉刚六十多年的学者生涯，它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而且，还能从中体味到顾颉刚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魅力。细读这些笔记，不时会发现，作者的喜怒哀乐之情往往跃然纸上、溢于言表。读书、治学真正成为这一代学者的生命存在方式。即使是在病中，顾颉刚还说：“特予读书已成痼癖，非此不愉，而笔记则犹行云流水，随笔书写，异于为文之集中精神。苟并此而不为，我之为人不将如行尸走肉者几希矣。”读书笔记，在顾颉刚不啻是一种生命节律的跳动，是一种文化性格的展示。

顾颉刚之勤于笔记，与他对这种文体形式所包含的中华文化内蕴的理解也有关系；同时，从这一角度又可以使我们对顾氏笔记本身价值的认识。他这样说：“予惟民族形式，此世所尚，亭林之书岂伊自为，亦承梦溪、容斋之绪也。是固我国文体之一种，证据欲丰而辞句欲简，脱不废整理古史、古籍之业者，其体实终古而长存。予之书苟能步武亭林，于愿足矣。”由此可见顾颉刚读书笔记的取法之高，旨趣之深且远。说到底，唯有以中华文化的承传光大自负者，才有可能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于学问之道而不辍。

本书将顾颉刚的读书笔记选辑成为四辑，辑名乃编者所立。第一辑“读书记序”，专收顾氏各册读书笔记的自序文字，以见其一生的读书过程；第二辑“书林谈丛”，辑收有关书籍史识的各种话题；第三辑“书人书事”，主要是围绕人与书的关系，说人评书，与上辑专论书事各有侧重；第四辑“理书发微”，则以学理心得为主。总括以上四辑，或可一言以蔽之曰“读书的学问”。

除了分类辑选外，编者的工作主要是整理标点，尽可能改正误植、错漏的文字，使之更为规范化。但限于编者的学识水平，其间难免仍有不妥甚至错误之处，尚祈读者方家予以赐教，以便前贤著述的整理出版更臻完善，真正裨益于如今的世道人心。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系顾颉刚先生的读书札记，因此行文中，书名、篇名有用全称，而更多的往往用省称，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作《四库总目》、《四库提要》或《提要》；《战国策》有作《国策》的；《竹书纪年》有作《纪年》的；《西厢记》有作《西厢》的；《三国演义》、《水浒传》有作《三国》、《水浒》的；《汉书·艺文志》有作《汉志》的；《史记》、《汉书》有作《史》、《汉》的；《淮南子》、《韩非子》有作《淮南》、《韩非》的；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写成《伪经考》；《古今图书集成》写作《图书集成》等。例多，不具举。为了尽可能保持顾先生读书札记的“原汁原味”，凡容易理解的，一般均仍其旧，不作改动。

也有不容易理解的，如阎若璩《潜邱记》写作《记》；俞正燮《癸巳类稿》、《癸巳存稿》写作《类稿》、《存稿》，为使行文明确，遂加字，改成《潜邱记》、《癸巳类稿》等。

本书的辑选出版得到了顾潮女士的大力支持，谨此深表感谢。

编者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总 序

钱谷融

称之为“书话”的一类文字，现在写的、读的和谈的人渐渐多起来了。但是，如果要考究这种文体究竟起于何时，创于何人，或初见于何书，倒又没有一定之说。包括“书话”的名目，其始用和沿袭的源流，似乎同样的不甚明白。恐怕它与其他各种文体一样，是经过不短的历史而逐步形成的吧。

中国自古就有为书籍（藏书）写题跋的传统。题跋的形式一般都比较简短，内容则相应广泛，诸如版本、装帧以及购藏经过，读后的印象、心得之类，都有所涉及。甚至也有借题发挥地针对当时的政治形势、社会风习发些议论的。可谓不拘一格，最为灵活自由。大凡爱书的人每得一种新书，在诵读赏玩之余，总不免要随手写上一些有关该书的话题。这种文字可能也就是后世所谓书话的发端。但较之于传统的题跋，现在的书话在写法上大多更侧重于对书的内容、义理的品评、阐发，这也是势所必然，因为传统题跋中的某些重要话题，如版本等，对于晚近新刊书籍来说，几乎已经无话可说了。这从一个方面也可以说明，“书话”的文体和内容有其因时代不同而变化的特点。不过，作者的手眼和品性的高低，在书话中却是一目了然的。

书话看似学术中的小品，其实也是很难写好的。它首先要求作者有丰富的读书经验。读书不多，就无以鉴别书的品质优劣。勉强议论，往往无的放矢，不得要领，而这又与作者的学识有关。书话贵在体现作者独到的品书心得，不仅提供有关书的知识，而且也需研求学问，抒发一己之见。即使是对事实、材料的陈述，也能见出作者辨析、取舍的独出心裁。所以，书话中的高手，往往也就是学问上的大家。博约精审，同样可以作为书话作者的基本要求。此外，书话的行文虽无一定之规，但严格说来，也有相当的约束。立言有据，言简意赅，阐明书品，指示路径，这应该是书话的文体精神。空发议论，枝蔓无度，则是书话的大忌。书话自然也得有情趣，能使人从字里行间品味作者的性情，体会到读书的愉快。但这往往是由一词一句引人会心一笑，如果一味铺陈，专事抒情，即使文字颇为耐读，却也大失书话的旨趣了。

近代学者中，可称以“书话”名家者，有叶德辉、傅增湘、周作人等人，但更多的则是在专门著述之余，以题跋、序文、札记、叙事等形式，留下了极为可观的书话作品。如这里收录的王国维、梁启超、刘师培、林琴南、刘半农、蔡元培、顾颉刚诸人，都是其中彰明较著者。在作者本身，或许对此并不经意，但对现今的读者来说，仍不乏裨益。从中既可领略近人的学术境界、品书趣味，也能看出书话这种文体在近代的流变。

我平时虽然也很喜欢读题跋、书话一类的文字，却并不是此道中人。现在浙江人民出版社计划出版这套《近人书话系列》，又有主编之命，且嘱为序，自感庸陋，深以任非其人为惭，但盛情难却，不得不敬献绵薄稍尽襄助之责，故略陈鄙见，以就教于广大读者。

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日

顾颉刚说话

读书记序【近人书话】

寒假读书记序

余读书最恶附会，又最恶胸无所见，作吠声之犬。而古今书籍犯此非鲜，每怫然有所非议，苟自见于同辈，或将谓我为狂放，惟此册是归焉。吾今有宏愿在，他日读书通博，必举一切附会，一切影响，皆揭破之，使无遁形，庶几为学术书籍、人心世道之豸。班固蚩傅毅曰，下笔不能自休。吾每每亦然，不能简赅出之，斯则甚为惭也。其有读书所得，或印证可求，虽在小品，亦登于斯。

民国三年十二月十六日颉刚记

琼东杂记第一册

民国九年九月，自仲川处迁至大石作卅二号，与缉熙、子水同居。此地东为景山，西为北海，南望清宫，气象至伟壮。我居三间，虽向北，而悉力布置，图书盈壁，亦颇雅适。数年积想，今始见之，精神为之一慰。念我自先妻之病，至于今日，已三年矣。此三年中，我精神盖无一刻之安，事又丛集，悲烦交乘，遂致不眠。学问无寸进，而身体日以亏损，年二十余，见者谓似三四十岁人。我不悲我老，我悲我之由老及死，而学问之愿未能酬也。今幸有宽庭精舍，供我静修，虽资财无所出，馆事又劳，家中之事，又不能使我愉快，病又弗却，稍于夜间读书讲话，则达旦炯炯，皆使我不能如意，然较之前三年中则已善矣，固能给我以居处上之慰藉矣。继自今，我能假此慰藉以多读书乎？以多致思乎？我虽不能刻苦奋进，我其能日寸而旬尺乎？前数月与介泉书曰：“我所求的生活：（1）秩序的生活，（2）进步的生活，（3）美术的生活，（4）健康的生活。”美术的生活，今差近之矣。秩序的生活，方将毕力企及，今夜饭后扃门，九时就眠，六时许起，日一下便，皆为之矣；而读书治事之秩序，犹未能定。健康的生活，企之而不能自必也。独进步的生活，则言之而最可愧也。今能由美术、秩序以至于健康，能由健康以至于进步乎？嗟乎！此数年之间，人事疾病，所以磨折余者，亦至烈矣；今我将以绮望楼、琼华岛为我屏藩，而悉驱除之。我其善为之，有志者成，毋自馁也

九年十月廿二日颀刚记

琼东杂记第二册

这本书竟记了半年，可见我这半年实在没读书，惭愧！但这里亦自有故：在学校办事时，实在太忙了，上午到图书馆，下午到研究所，一天竟没有暇时。

二月中，我祖母骤患偏中，病势凶险，家里打电来，归家侍奉二旬，连道中时日，也费了一个月的工夫。在这一个月里，只把宋濂《诸子辨》抄完了。

适之先生做《红楼梦考证》，嘱我寻觅材料，我为好奇心所驱使，愈聚愈多，到京师图书馆的回数当有十次，写与先生及平伯的信有二十余通，这也费掉一个多月的工夫。现把这书信集成三册，算是半年中惟一的成绩。

此外，《辨伪丛刊》上费去我的工夫不少，但至今尚无一种成功。

我不解我这半年中为什么做的事情这般少？我的时间哪里去了？

颉刚记十年六月九日

侍养录第一册

这册从六月二十一号记起，至八月五号记完。在这册没有记完的时候，早已先记了第二册至第四册了。所以如此的缘故，因这册要抄的几段报纸，都没有工夫抄，竟捺下了好几十天。

适之先生教我赶将《辨伪丛刊》编好，使我不得不很急促地去看书。要看的书里，有一种《郡斋读书志》是向学校借的。我自己的书，要圈点就圈点，要批评就批评，往往涂得满纸，而笔记上无一字。这部书可不能了。但既已通读一遍，就觉得有许多可取的材料不忍放过的。书上既不容我涂写，只得尽量抄上我的笔记。所以这三天看了十册书，随看随抄，竟尔把留下的空页都写完了。

不能在书上涂写，因是借书的苦；但因为抄写一遍，使我对于要着眼的地方记忆得更牢，也是借书的好处，只是几天来写得胸部闷起来了！

颉刚十年八月五日夜

侍养录第二册

这册自六月二十七号记起，至七月五号记完，首尾不过九天，实是笔记册里最快的一本。其故有二：

一、这里的一小半，都是从京师图书馆里杂抄来的，现在转誊在这册上，颇不费事。

二、新近看了冯桂芬、严可均、王颂蔚等的文集，有契于余心而抄录上者也很多；《日本之海外侵略》一文又抄了六页。所以一册也就完了。

我虽随便看书，拉杂抄录，但自以为也有个宗旨，便是“表曝社会状况”，学问社会的状况尤是我所注意。我总勉力搜集史料备将来的作史。

此外关于目录学的也很多，因为我欢喜做这门学问。

十年七月五日夜颉刚

侍养录第三册

这一册从七月五号记起，至二十二号记毕，首尾不过十八天，也算快了。

此十八天中，吴敬轩到苏费了三天，绍虞喜事费了一天，到可园买书又费了一天，其余同学暑假聚首的很多，大约破费也在五天以上。

此十八天中，买了多少书，买了即看，看了有得即抄。此十八天中，遇见多少朋友，听了无数谈论的话，归来记得，便录上了这册。

今天记了《复堂日记》，看所剩的页数无几了，便想本日记完了它。记忆所及写完之后，再把怀中记事簿上的摘记写上。恰好今天没有朋友来访我，写到傍晚，居然完了。

我自知这册所记拉杂万分，但总向史地方面做去，这是还可自信的。

十年七月二十二日颉刚

多少：犹言若干。

侍养录第四册

这册是从十年七月廿四日起，到九月十三日记完的。

这五十天之内，实在忙了一个月没有读书。八月十二日到上海，接洽编历史教科 事，住了三天；又到杭州省亲，校勘《黄氏日钞》，也住了三天。归后，预备北行，料理物件，住了六天，就到上海由海道到京。到京之后，会晤亲友，检理什物，又是忙了十天。所以这一册虽是延了五十天，其实只是廿余天的读书记。

在家时记到七十一页；以下二十三页，都是这六天内记的。

十年九月十三日颉刚

景西杂记第六册

予之居大石作也，与吴缉熙、潘介泉、毛子水三人分租两院，三人皆北大同班同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兼预科讲师者也。其时往来较密之教授为钱玄同、胡适、马裕藻、陈垣、沈兼士等。日月推移，迄今已四十年，缉熙及钱、马、沈诸师皆谢世；介泉虽在，亦病神经错乱，不复能任工作；胡适与毛子水，或居美国，或住台湾；惟予与援庵先生同中国科学院，虽均老病，尚能从事本岗位之业务耳。其时王伯祥、叶圣陶亦应北大聘，任预科教员，假寓东厢，颇有谈论之乐。不及一年，皆以学校欠薪，无术贍家，改任商务印书馆编辑。予亦以祖母病偏中，初则往返京、苏，继则乞假居苏，及祖母没，父以不能辞杭职守制，予妻履安代奉灵帏，予遂入商馆，与伯祥同居者一年。今在京中，与伯祥之宅密迩，复有朋从之乐。

一九六一年七月颉刚记

旅杭杂记第一册

一九三四年夏，予与燕大诸友方游察、绥，突接父电，悉继母宋夫人病重。仓遽返京，知已逝世，遂至杭寓治丧。以父老，未即返校，恒抄撮书籍及友人来函，成兹两册。然丧务栗六，自己读书却无几也。

颀刚记

栗六：俗称忙碌为“栗六”，亦作“栗陆”。

皋兰读书记

自九一八事变后，予迫于爱国之情，先创办三户书社于燕京大学教职员抗日会中。其后青年纷至，非学校团体所能容，遂别创通俗读物编刊社于城内，大量播传抗日思想。日本军人恨之刺骨，而华北民众则甚乐读此类刊物，故国难日殷而社中同人意气愈激发。及七七事变起，北京已在前哨，宋哲元至天津求媾和，日人提出数条件，通缉抗日分子居其一，抗日分子中又以予居首，予遂不得不出走，走则至甘肃。编刊社同人以予在彼，群度六盘山而至，故社址亦移兰州。其时甘肃学院院长朱君聘予为教授，予方谋治《左传》以应校课，而院中易长风潮突作，予迁居临洮，教育厅长葛武荣以予得青年心，与之立老百姓旬刊社，复以通俗读物编刊社中出有《平型关大战》诸书，为共产党张目，控予于国民党中央政府。予避其锋，西行至渭源、临潭、卓尼、拉卜楞、河州诸地，观汉、藏、回诸族之杂居及喇嘛教、伊斯兰教之活动，若入一新世界者。故此册所记多为西倾山一带之史地资料。然彼时实不能从事研究，故每覩一新资料，只摘抄其大凡而已。噫，如予不遭葛氏之攻击，予又安得见此之林林总总之新事物耶！然粗涉其樊而不得深索，此又予毕世之恨也！

颉刚记

浪口村随笔第一册

予于一九三八年秋末，自渝飞滇，任云南大学教职。冬初，履安携自珍由海道来昆明，暂居白果巷吴辰伯家。然日机轰炸频仍，城中势不可居，乃移家于北郊浪口村。其地距城二十里，友朋非必要则不来，颇得闲静读书之乐。迨一九三九年一月，得吾父在苏弃养之电，中心摧折。为摒挡家事，履安于六月中归去，而予以在滇频受北大同学排挤，送至成都，执教于齐鲁大学。是年秋，履安携自明至滇，转飞蓉城，予迎之于飞机场，见其面容憔悴，额生褶皱，宛若其母，心惊小别才数月，何竟老至廿年，知往返万余里，力已不任也。然观其眠食如常，则以为积劳至是，稍息当可康复。何期一九四一年之夏，予又受人之打击，愤而去渝，忽接家书，履安便血，归而送医院验之，则肾结核也。一九四一年，渠疾稍瘥，复飞重庆，与予同居柏溪。一九四二年夏突病，病三日而长逝矣，痛哉，痛哉！此笔记五册，皆予居滇、蜀所作，即为履安有生最后之五年。每一展卷，辄回忆当时情事，泫然不能自禁。用记于此，以志倭寇侵略、丧我淑人之恨焉。

颀刚记

此数册曾整理，付齐鲁大学《责善》半月刊发表，一九四九年前又曾在沪油印出版，但仅印百册耳。

刚又记

西庑读书记

西庑者，成都学宫之西廓也。时李源澄君居此，予因借一椽，为自修之地。其地人所不至，故颇得读书，然予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为职务所困，亦不克常至也。是时予与履安皆多病，予血压高至百八十度，时苦头晕，履安则日瘦弱，不知其所患者为何。长女自明、次女自珍皆在成都，家中殊不寂寞。蜀中风物颇与苏州相似，亦有随遇而安之想。惟东望故乡，终不免恻恻耳。

颉刚记

当记此时，敌机轰炸正剧，恒似夜来，予等辄避至田亩中，仰望上空，敌先投照明弹，其色或绿或黄或赤，彩色烂然，宛似上元灯火，为之开颜，然俄顷则大声突发，所着处均火起矣。八年抗战，除后四年在重庆，有防空洞可掩护外，兰州、昆明、成都城区皆无山，惟有匍匐于农作物中而已。且飞机一批方去，一批又来，谓之“疲劳轰炸”，恒终宵不得合眼，此或系予血压增高之一因乎？成都之炸，常投烧夷弹，以是编户列肆忽成瓦砾之场，死伤每以千计。予之迁家于北郊崇义桥，即为逃此厄运也。今当整理笔记，思思前尘，犹觉不寒而栗。用书于此，以示后人。

颉刚又记